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对标研究

张亚军[1]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200032)

【摘 要】：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从产业发展方向看，要提升高端服务体量，加强中端智能制造，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从产业发展驱动力看，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开放型经济注入新动力，促进产业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从产业发展着力点看，要提升本土总部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的能力，以平台经济为载体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以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培育良好市场环境。

【关键词】：高端产业 引领功能 高端制造业 高端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F26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21)12－0027－009

一、问题提出

高端产业目前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大部分学者通常将其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高端产业是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处于控制地位的产业，广义的高端产业则涵盖各产业层次中具有先进性和控制力、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产业。本文主要讨论广义的高端产业，并认为高端产业和传统产业不应完全割裂，传统产业是可以通过改革升级向高端化演进的，传统产业中的头部创新高端企业也是产业高端化过程中的引领者。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坚持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战略定位，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城市产业发展往往与其城市功能的变迁相辅相成，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恰恰是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基于城市产业发展的研究视角，通过梳理伦敦、纽约和东京 3 座城市自建城以来产业演进与功能变迁的历史轨迹，总结城市功能跃迁过程中产业高端化发展的阶段、特征与规律，进而探索上海城市功能跃迁与能级提升之路，以期为上海产业高端化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和政策导向。

二、国外先进城市经济体产业演进与城市功能变迁的历史进程

(一)伦敦产业演进与功能变迁的历程

1.从港口贸易中心城市转型为现代工业城市

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伦敦的制造业不断成熟；18 世纪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前半段，伦敦的工业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至 19 世纪中叶，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规模急速攀升，初步迈入世界大都市的行列。

[1]**作者简介**：张亚军，经济学博士，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经济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18BJB003)

2.从老牌工业城市初步转型为服务业城市

19 世纪初，伦敦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急速下降，1861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 61%,伦敦产业正式步入服务业主导阶段。1870 年代，英镑成为世界通行货币，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伦敦已充当起世界经济的清算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由此奠定。1875 年，伦敦人口高达 424 万，相当于巴黎和纽约两大城市人口的总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自此诞生。而后，无论是与自身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巴黎和柏林的横向比较，伦敦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都愈发明显，“一战”爆发前，其服务业就业占比已升至约 62%,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则降至约 38%。

3.向服务经济城市深度转型

伦敦在历经了 200 年的工业化尤其是一个多世纪的重化工业阶段后，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在城市内部发展瓶颈与外部环境恶化等多种因素的强烈驱使下，自 1960 年代中后期开始，伦敦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的深度调整期。其中，1970 年代初至 1980 年代末是其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在此期间制造业企业纷纷迁移至郊区，制造业就业人数从 1971 年的 130 多万猛降至 1990 年的 40 万左右。

与制造业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伦敦的服务业接收了大量产业转移人员，进一步蓬勃发展，商务服务业、酒店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就业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伦敦的服务业结构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1960 年代至 20 世纪末，伦敦成功完成了服务业的高端化转型。至 20 世纪末，大伦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0.20%、16.42%和 83.38%。

4.产业高端化引领创新驱动转型

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伦敦金融城聚集了全球数百家金融机构和历史悠久的银行、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以及 30 多万名从业人员。在伦敦金融城内的 2.5 万家公司中，大型企业(员工人数超过 250 人)只有 240 家，其余都是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极大地增强了伦敦金融城的城市活力，也为大企业输送了不少创新产品及技术资源。伦敦金融城对中小企业有不少政策优惠，如便捷的报税流程、提供高达 2000 英镑/人的就业津贴等。

全球科技中心正成为伦敦全球金融中心之外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截至 2019 年 4 月，伦敦科技行业的就业人数达到约 53 万，比金融行业多大约 20%。2006—2017 年，伦敦科技行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72%,科技企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89%,整个生态系统价值高达 440 亿美元，预计到 2026 年，该行业的就业人数还将增加 17.2%,达到 28.44 万人，科技企业数量增加 30.4%,达到 6.18 万家。

伦敦还是全球创意产业的领导者。1997 年，英国政府就将创意产业列为国家战略发展产业。2000 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以 52.5 万人的就业人数占各产业排名第 3 位。2015 年伦敦的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近 420 亿英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1.1%。2009—2015 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产值增长 38.2%,占各产业增加值的 30.6%。2016 年伦敦创意经济提供了 88.29 万个就业岗位，占全市就业岗位的 16.9%,相较 2012 年增长 24.2%。2018 年 12 月，伦敦市市长发布“CultureforAllLondoners”的文化战略。2020 年 3 月，伦敦市政府发布自该战略实施以来的成果报告，报告显示伦敦创意产业的产值从每年 470 亿英镑增加到每年 520 亿英镑。

(二)纽约产业演进与功能变迁的历程

1.从商贸枢纽城市转型为多功能“经济首都”

17、18 世纪之交，纽约已初步发挥起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对外开展与宗主国及其他地区的贸易，对内通过设立农产品交易集市和兴建道路，带动农产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纽约城市自治权回归，加之欧洲战争爆发带来的机

遇，使其在 1785 年被定为美国的首都。19 世纪初，纽约出台了 3 项举措来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加上 1825 年伊利运河的完工与铁路运输系统的完善，纽约商贸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到 1860 年，纽约进出口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伦敦和利物浦的第三大港口，巩固了其国家商贸中心的地位。

随着商业贸易兴盛而来的是资本的充足积累和资源的丰厚储备，1840—1860 年，纽约的工业投资增长了 550%。同时，资本的大量集聚也推动纽约金融业的兴起，19 世纪 30 年代，纽约的证券业遥遥领先于费城等美国其他城市，到 1860 年，纽约注册银行数已高达 82 家。在该阶段，纽约已具有美国金融中心的雏形。

2.从制造业主导城市初步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城市

19 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期间，纽约制造业受到冲击，但在紧随其后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纽约制造业的发展势头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得更加强劲，并在 19 世纪末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中期，除“一战”和“二战”等特殊时期，纽约的制造业发展较为稳定，就业人数始终保持持续增长，但是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却呈逐渐下降的态势，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加大。进入 20 世纪，纽约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服务业的增势明显。自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经济地位持续上升，成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纽约也登上了经济控制与决策中心的高峰。“一战”结束后，纽约超越伦敦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3.向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城市转型

1950 年代，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从而开始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纽约的传统制造业由盛转衰，但通过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以及从传统服务业主导向现代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纽约从工业化城市顺利过渡到后工业化城市，成功摆脱制造业衰退的阴影并再度繁荣。

1950 年，纽约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整个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 29.95%,而从 1960 年起逐渐减少，到 2000 年时制造业就业比重仅为 6.53%。从制造业退出的大批就业人员逐步向服务业转移，狭义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从 1950 年的 14.64%上升到 2000 年的 39.17%,同时，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也显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其就业占比从 9.69%提高到 13.20%(表 1)。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纽约的服务业开始朝高端化转型，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 1969 年的 25%攀升至 2000 年的 62%。截至 2015 年 4 月，纽约服务业分行业就业占比最高的是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业，达到 22.15%。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为 17.23%,居第 2 位。金融业在纽约主要服务业行业中依旧保持较高的就业占比，但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占比下降 2.85 个百分点，是除政府机构外，降幅最大的(表 2)。

表 1 1950—2000 年纽约就业结构变迁 单位：%

产业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采矿业	0.06	0.06	0.05	0.03	0.00	0.00
建筑业	3.55	3.59	2.99	2.33	3.22	3.28
制造业	29.95	26.77	20.45	15.03	9.48	6.53
服务业	14.64	17.16	20.99	27.05	32.21	39.17
贸易业	21.76	21.06	19.63	18.57	17.05	16.85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9.69	10.85	12.23	13.57	14.58	13.20
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9.57	8.99	8.62	7.79	6.42	5.73
政府机构	10.78	11.53	15.03	15.63	17.05	15.24

注：①表中数据为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②表中的服务业特指狭义层面上的服务业。资料来源：根据陈志洪、高汝熹、管锡展《纽约产业结构变动及对上海的启示》相关数据整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集中体现。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重心将向健康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层级攀升，从而为高端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

4.产业高端化引领创新驱动转型

处于产业价值链金字塔尖的金融业是纽约的核心产业之一，虽然随着经济多元化战略的推行，纽约对金融业的依赖逐步下降，其从业人员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华尔街对全球经济的调配和控制力丝毫不减。

凭借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产业基础，21 世纪以来纽约科技行业发展迅猛，成为纽约湾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06—2016 年，纽约的科技从业人数增长了 8 万人左右。区别于硅谷的“东岸模式”,纽约的生态系统比硅谷和伦敦更为多元，新创公司社群迅速壮大，更容易获取资本和人才资源。2007—2016 年，纽约互联网及应用就业人数增长了 28.7%。

表 2 2000—2015 年纽约主要服务业行业就业比重变动趋势 单位：%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5 年	百分比变动
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	16.68	16.24	15.87	15.96	15.86	15.76	-0.92
信息服务业(51)	5.48	4.82	4.71	4.76	4.73	4.72	0.76
金融业	14.29	13.19	12.17	11.89	11.51	11.44	-2.85
#金融和保险业(52)	10.81	9.69	8.84	8.68	8.35	8.31	-2.50
#房地产和租赁业(53)	3.48	3.50	3.33	3.21	3.17	3.13	-0.35
专业和商业服务业	17.16	16.47	16.35	16.80	17.16	17.23	0.08
#专业和科技服务业(54)	9.38	9.00	9.09	9.52	9.73	9.89	0.51
#商业服务业(55)	1.55	1.72	1.80	1.79	1.79	1.80	0.25
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业	17.95	20.07	21.36	21.29	21.72	22.15	4.20
#教育服务业(61)	3.70	4.34	4.83	5.01	5.18	5.36	1.66
#健康医疗和社会福利业(62)	14.25	15.73	16.52	16.28	16.54	16.79	2.54
休闲和住宿餐饮业	7.51	8.20	9.15	9.90	10.43	10.29	2.79

#艺术、娱乐与休闲(71)	1.65	1.82	1.91	1.99	2.10	2.11	0.46
#住宿和餐饮业(72)	5.86	6.38	7.24	7.91	8.34	8.18	2.33
其他服务业(81)	4.31	4.54	4.56	4.61	4.60	4.63	0.32
政府机构(92)	16.63	16.46	15.84	14.79	13.98	13.78	-2.86

注：根据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服务业在二位数代码层面主要包括 15 个分行业，表中标注#符号或括号中注明二位数代码，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即为主要的 11 个分行业，既标注#又注明代码的行业归属于前一栏无任何标注的行业。资料来源：根据纽约州劳工部公布的“New York City Current Employment Statistics”相关数据整理。

纽约更是文化之都。进入 21 世纪以来，创意文化产业成为世界各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06—2016 年，纽约创意产业的增速远高于其他行业，全行业平均增速达到 12%,远高于金融和保险业 0.1%的增速。2013 年以来，纽约在支持文化创意产业方面投入的资金最多，达到 1.5 亿美元。2019 年 7 月，纽约发布了全新的“CreateNYC”行动计划，显示 2020 财年市政府将为该计划投入 2.12 亿美元。长期以来，纽约市政府文化创意领域的投资额居全美第 1 位，迅速成长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纽约顺利完成创新发展转型，从而巩固了其世界城市网络中心城市的地位。

(三)东京产业演进与城市转型的历程

1.从贸易中心城市转型为制造业主导城市

1603 年，德川家康建立以江户为据点的幕府政权，江户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同时，基于面江临海的区位优势，江户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城市。1868 年，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大力学习欧美先进技术，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作为日本最发达城市的东京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完成科技革命，东京工业化初期阶段完成，制造业产值比重超过其他产业，开始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1950 年代中期，在日本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指导下，东京的重化工业进一步得到集中快速发展。

2.从制造业主导城市转型为服务业主导城市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重化工业阶段持续了约 15 年，1961 年制造业发展达到顶峰，此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重开始下降，东京步入后工业化阶段。1960—1998 年，东京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 40.16%降至 21.81%,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则从 58.91%升至 78.14%。尽管从整体看东京制造业的地位下滑，但制造业内部以电气机械为主的机械工业产值成倍增长，汽车工业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也就是说，东京制造业的行业结构向着高端方向演变。

与此同时，服务业企业逐渐向东京集聚，尤其自 1970 年代起，第三产业成为推动东京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中，金融和保险业占东京 GDP 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8.13%提高到 1990 年的 9.70%(图 1),至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东京股票市场的交易额达到 288 万亿日元，高居世界第 1 位，外汇市场的交易量达到 6 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 25%,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 2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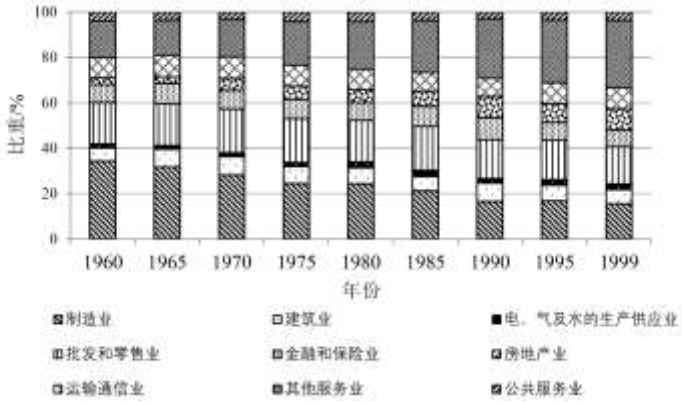

图 1 1960—1999 年东京各主要行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

注：1960—1974 年、1975—1999 年各主要行业的增加值分别以 1980 年和 1990 年价格为基准，整个考察期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均按照 68SNA 分类体系进行。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县民经济计算》相关数据整理。

3.产业高端化引领创新驱动转型

1980 年代后半期，东京、纽约和伦敦被称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但东京在 1990 年代以后失去金融优势地位，直到 2020 年才超越中国香港，重返世界前 3 位。

日本企业在全球高端制造业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部分装备产品、关键零部件和中间材料领域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或重大影响力。文化输出更是东京的核心优势，1980 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理念，此后东京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东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2001—2007 年，东京文创类上市公司数量稳步攀升，从 239 家增加到 305 家，增长 27.62%。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文创类上市公司数量开始减少，至 2011 年又开始复苏，并于 2014 年恢复至 2007 年同期水平。2019 年，《东京 2040》中提出要将数字艺术等先进技术与日本传统艺术相结合，展现东京独有的艺术与文化。截至 2019 年底，日本文化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12 万亿日元，早已超过钢铁等传统支柱产业。东京正在努力构建一个跨区域、跨行业、跨代际的无界创意城市，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而稳固、提升其作为全球枢纽城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上海与国外先进城市的对标分析

(一)上海的短板分析

1.金融产业影响力不足

上海现阶段还存在金融产品相对不够丰富，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全球投资、融资中心的功能作用发挥不够，金融交易场所的国际影响力不足等薄弱环节。

2020 年 3 月，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共同发布第 27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7)报告，该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序，其中上海列第 4 位，排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

一是在金融交易场所方面。相较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是全球最重要

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对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商品的定价具有指导作用，而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等的国际影响力还不足，上海目前还不是最活跃的国际金融交易场所城市。

二是在涉外金额税收方面。目前，上海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制度尚未建立。相较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企业的税赋大多高于国外同类企业，也高于国内其他行业。例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上海目前为 25%,纽约为 21%,伦敦为 20%;在利息收入增值税方面，上海为 6%,纽约、伦敦等地则不征收。较高的金融税收导致上海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减弱，制约了涉外金融活动发展。

因此，上海应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和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创新活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外金融税制，优化金融发展环境，以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

2.制造业智能发展动力不足

上海应发展高复杂度、高集成、高收入弹性的“上海制造”,但目前上海乃至全国的科技研发投入难以转化为制造业收益，制造业发展动力消耗过度。

2018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 4748.1 亿美元，仅落后美国 781.7 亿美元，但研发产出的经济贡献率远低于美国。上海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接近 4%,拥有 36 所高等院校、104 家科研院所，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76 人/年、人均科技经费 25.92 万元，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 300%和 187%。2020 年，上海高校平均专利申请公开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159 项和 36 项，但同期北京高校的申请公开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265 项和 96 项，深圳高校同期的申请公开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284 项和 69 项，上海高校的专利水平落后于国内其他发达城市。2019 年，上海平均每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合同数仅 1.28 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每所高校累积实施许可 60.04 项)。科技成果对上海经济增长、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理想，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城市相比有明显差距。

3.文化创意产业形象未深入人心

上海在文化建设方面与其他全球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尚未打造出独特的鲜明特点，文化产品未深入人心。

伦敦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多样性。艺术和文化是伦敦作为世界级多元化城市的主要力量，伦敦也是全球一些知名的艺术和文化组织以及众多小型独立组织的所在地。伦敦拥有 557 个艺术画廊；世界十大博物馆和画廊中有 3 个在伦敦；伦敦 170 多家博物馆中，国家博物馆有 11 家；伦敦汇聚的语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伦敦 300 多个场馆每年有超过 1.7 万场音乐表演。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上海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 1632.68 亿元，占上海 GDP 的 6.5%。相较于伦敦，上海还有明显的差距，需要在文化创意经济的驱动下，在文化创意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更多积极的探索。

纽约是一个重要的音乐、电影、戏剧、舞蹈和视觉艺术中心，纽约文化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其规模庞大，有着极其丰富的种族多样性。很多文化运动都由纽约兴起。哈莱姆文艺复兴、美国现代舞、爵士乐、嘻哈、朋克摇滚和“垮掉的一代”都与纽约有关。时尚、电影和百老汇已成为纽约创意文化产业的重要名片。

东京文化注重传统与现代的共同发展与融合。东京不仅在时装、动漫等方面引领世界潮流，还有历史久远的神社寺院，落语、工艺、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保存和继承。东京拥有数量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表演大厅等，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还可以接触最新的流行趋势与先进科技成果。以具有文化特色的各个区域为据点，东京形成了原宿、秋叶原、浅草等特色鲜明的文化聚集区，拥有独特的活力。

(二)全球城市产业布局的三要素

作为全球顶尖城市，伦敦、纽约、东京的产业演进与城市功能变迁给上海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3 座城市的产业无一例外均遵循农业主导向制造业主导转型、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服务业内部传统服务业主导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转型、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型，以及近年来表现尤为突出的高端消费性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崛起。这些无疑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一致经历的发展阶段以及共同依从的客观规律。

此外，伦敦、纽约和东京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全球城市，除了城市内部的产业转型发展这一关键和主导推动力外，还与外部以科技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发展长波周期有关。与此同时，不同的世界城市又会因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以及所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种内外部差别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迥异的城市特质和个性。伦敦和纽约的制造业企业已所剩无几，而东京制造业尽管在后工业化时期地位持续下降，却实现了行业结构的优化，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行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仍保持较快的增速。

总体来看，全球城市产业布局应该具备以下 3 个要素。

一是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平台，深入参与并主导全球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从而占据价值链高端并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世界级城市能吸引全球人才、资本、技术，是研发创新、专业服务的头部区域。

二是网络化区域协同能力。从纽约的发展历程可见，纽约产业外溢及周边区域产业逐步升级是其屹立于全球城市顶端的重要原因。城市产业不仅存在梯度布局特征，也呈现基于市场、人才等的云状协同，整体形成了“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网络化发展格局。

三是高端化产业创新能力。不论是金融业、制造业，还是文化产业，创新活力是推动产业突破传统、高端转型的助燃剂。一个产业集聚区是否有活力，要看其中小企业的数量；一个城市是否有竞争力，要看其初创企业的数量，因此，中小企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活力源泉。不论是伦敦、纽约，还是东京，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是全球城市向世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

四、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战略思路

从产业发展方向看，一是提升高端服务体量。按照全球城市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最新发展趋势，进一步做大高端或高能级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体量，稳步提升其行业比重和生产效率。二是加强中端智能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将有可能改变现有的产业链分布，传统的“微笑曲线”状的产业价值链将会变得更加平滑，甚至很有可能变为“沉默曲线”,乃至“悲伤曲线”,全球城市在产业环节方面的管控功能不仅体现在前端的研发与后端的服务上，中间的高端智能制造环节也将是管控功能的重要体现。三是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制造和服务环节融合互动、相生相伴的趋势愈益明显，高能级服务业不仅是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还是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对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拓展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从产业发展驱动力看，一是创新驱动发展。紧紧抓住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契机，围绕创新驱动发展进行要素配置，聚焦体制机制创新、生态环境创新和人才激励机制创新。二是为开放型经济注入新动力。加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利用自贸试验区平台，探索全面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坚持发展总部经济，建设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发挥全球运营统筹功能；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建设全球人才高地。三是产业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上海要加速推进与长三角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形成良好的区域互动战略格局。未来，上海要通过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将长三角城市群连为一体，进一步强化

经济支撑、拓展空间支撑、深化机制支撑，从而产生巨大的城市集聚效应。

从产业发展着力点看，一是从产业发展微观主体上推动总部经济发展，提升本土总部型企业和平台型企业的能力，从而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掌控发展的自主权。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减少行政干预，促进不同市场的融合；另一方面，注重企业培育，催生具有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企业总部的诞生，进而促进本土企业融入和塑造全球城市网络。二是从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上，以平台经济为载体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进一步促进流量经济的发展。重视与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匹配的物流、金融、资讯专业服务平台的建设，增强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三是从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上，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投资、贸易、法律和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上海的本土企业也应在组织形式、管控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转型，以企业的全面升级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管控能力。

(二)高端制造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是加快构建产业技术研发体系。根据市场导向和上海高端制造业发展需要，以重大技术创新专项为抓手，加强科技原始性创新，加快具有战略意义的相关前沿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力求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独占性核心优势。共建自主创新产业价值链。面向未来创新活动从技术供给推动向市场需求拉动的大趋势，通过创新制度设计和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学—研—产”接力机制，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二是科学制订长三角区域的发展规划，构建完善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建立上海与周边地区研发成果异地转化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上海科技服务能力的提升，推动研发成果更好地实现产业化，形成长三角区域面向全球市场的完整价值链体系与高能级产业集群。促进科技资源共建共享，联合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推动长三角区域构建完善的研发共享网络，并通过跨界创新等方式激励长三角其他地区中小企业使用上海的研发资源。

三是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建立健全适应高端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资源配置体系。完善国际技术人才流动管理政策，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便利程度。

四是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高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上海高端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重点引进民间资本，探索建立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合作机制，并力求合作双方能够做到权利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改进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从而加大创新激励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激发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

(三)高端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各行业领域的准入限制，构建统一、平等和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服务业的良性竞争和发展。通过深化“负面清单”制度，加快国际通行市场准入规则的建设，切实推进重点行业的准入放宽。

二是优化市场监管模式。探索形成混业监管模式，推出适应服务经济自由化、便利化的监管措施。降低政府介入程度，创新非传统业务监管模式。

三是形成一体化人才保障和激励政策。强化政府资源整合，完善人才政策，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全方位营造服务环境。将对产业的扶持转向对创新创业人才的扶持，特别是加强对兼具创新思维和市场意识的创业型人才的扶持。

(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重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效应。政府应在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外部化方面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扩大制造业需求效应，把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制造业培育成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借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服务业的开放，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重塑服务业发展机制。

二是降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冰山成本”。按照中央简政放权的思路，清理冗余的规章制度，为产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加快建设规范平等、公平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一方面，不断培育如移动互联、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的发展，实现制造技术与服务形态的深度融合，拓展整个产业系统的发展空间和获利能力。另一方面，从机制和组织方式上完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机制，引导大型制造业企业提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能力，鼓励制造业企业有针对性地剥离服务部门，推进服务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楠.高端产业产能不足成因分析与解决方案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7,35(5):41-44.

[2]李敦瑞.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工业污染空间格局的演变[J].经济与管理，2016,30(1):49-53,96.

[3]权衡.强化四大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这个新要求，有何深意?[EB/OL].上观新闻，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187868.

[4]Hall P.G.The Industries of London since 1861[M].Routledge,1962.

[5]Lawrence J.,Dean M.,Robert J.The outbreak of war and the urban economy:Paris,Berlin,and London in 1914[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2(45):564-593.

[6]Ranald C.,Michie R.C.The City of London:Continuity and Change,1850—1990[M].Palgrave Macmillan,1991.

[7]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Annual Business Inquiry[M].Greater London Authority,2003—2009.

[8]陈志洪，高汝熹，管锡展.纽约产业结构变动及对上海的启示[J].上海经济研究，2003(10):49-57.

[9]周振华.伦敦、纽约、东京经济转型的经验及其借鉴[J].科学发展，2011(10):3-11.

[10]秦焕梅.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评估与建议[J].科学发展，2020(2):37-47.

[11]左学金，等.世界城市空间转型与产业转型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2]陈佳靓.国内外城市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探究——以伦敦和上海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9,6(57):17-19.

[13]常旭华.加快上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突破性政策举措[J].科学发展，2020(2):5-19.